



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 编写

当代世界宗教问题



DANGDAISHIJIE
ZONGJIAOWENTI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 编写

当代世界宗教问题



DANGDAISHIJIE
ZONGJIAOWENTI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世界宗教问题/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 编写 .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8

ISBN 978-7-80123-878-8

I. 当… II. 国… III. 宗教-研究-世界 IV. B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077853 号

当代世界宗教问题

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 编写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84024158(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秀秀

版式设计: 高秋兰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36 印张 360 千字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书 号: ISBN 978-7-80123-878-8

定 价: 69.00 元

绪 论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近代宗教学奠基人麦克斯·缪勒认为,宗教是对某种无限存在物的信仰;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宗教是对超人力量讨好并祈求和解的一种手段;费尔巴哈认为,宗教就是异化了的人的本质,神学就是人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①。我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提出了如下定义:“宗教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②。

深入研究宗教现象和宗教问题就会发现,宗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宗教对许多国家的内政外交都有重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6-667页。

② 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79页。

影响;宗教问题对当今国际政治有深刻影响,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一、宗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现象

宗教自产生以来便一直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对世界上许多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宗教是世界上许多文明的重要因素。现代西方的一些著名学者大都把宗教当作一种十分重要的历史现象来看待。汤因比将文明看作宗教的载体,宗教是目的,文明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或工具;宗教赋予文明中的非宗教因素以要旨、终极意义和判断力;离开宗教要素,文明便失去意义^①。道森通过深入挖掘基督教的西方文化根源后指出:“如果像我所深信的那样,宗教是历史的钥匙,那么,除非我们理解了一种文化的宗教根源,否则,就不可能理解这种文化”,“伟大的宗教并不是世界各大文明所产生的副产品,在十分真实的意义上,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确立于其上的基础。”^② 在经过世俗化冲击的现代社
会,特定文明与特定宗教的历史对应关系仍然清晰可见,以至于在研究划分世界文明时,许多学者仍把宗教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划分标准,并以特定宗教来命名特定世界文明,如基督教文

①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② 克里斯多夫·道森,《宗教和西方文化的兴起》,长川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明、伊斯兰文明等。我国学者并不认同这种“宗教决定历史”、“宗教决定文化”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在西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研究世界宗教演进史和世界文明发展史,也可以发现宗教与文明之间的对应关系。西亚和南亚次大陆是世界许多宗教的两大集中发源地,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均发源于此。基督教以欧洲为中心,向南北美洲和亚非一些地区发展;伊斯兰教则以中东为基地,南向北非、东向南亚、北向中亚扩张,形成穆斯林世界;而佛教则北传南播东渐,遍及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中心亦移至中国。无论是世界宗教起源的两大板块,还是发展出来的三大体系,都与许多人类社会文明(古代西亚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兴起与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其次,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主要形式,对人类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重大影响。宗教关注的是生死问题,是一种生命观,因而成为一种入脑入心、具有内在约束力甚至精神控制力的信念,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同等的。蒂利希认为,“宗教,就这个词的最广泛和最根本的意义而言,是指一种终极的关切。”^①

从世界史看,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宗教信仰;从古到今,也没有一个时代没有宗教;在人类社会各个形态,信仰宗教的人口都一直占多数。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是该部落和民族的民众都要

^① 保罗·蒂里希,《蒂里希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

信奉的宗教,特定宗教与特定群体具有对应关系。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古老的自发产生的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是不传布的”^①,只有在世界宗教出现后,宗教与民族文化背景相分离,加上人对世界认识的逐步深化,无神论者逐渐出现,阵营不断壮大,全世界信奉某种宗教的人口比例从最初的百分之百,逐步下降到今天的80%以上。

第三,进入近现代后,从世界范围看,宗教总体上仍在发展,并没有出现衰减的趋势。18世纪欧洲唯物主义者曾经预言,随着科学的节节胜利,宗教将很快被逐出历史舞台。但两个世纪以来的情况并非如此,在生产力的空前增长、科技飞速发展、人类文化素质普遍提高的同时,宗教也异彩纷呈,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在一些地方颇有升温之势。究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宗教存在的根源远未消除,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为宗教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土壤。一方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了传统价值观缺位、信仰失落、道德缺失等现象;世俗化、现代化和科技发展并不能解决人们对宇宙、生命的根本认知和意义问题,因此,宗教的发展存在一定空间。另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同时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宗教文化交流的增加刺激了一部分人对外来宗教文化的兴趣,同时也刺激了传统宗教的复兴。这样,传统宗教持续发展,新兴宗教开始升温。作为世界宗教格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5页。

局中最主要的两支力量,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基督教重心东移、南移的现象非常明显,中心也转移至美国,基督徒人数增长比较快的地区集中在亚非拉地区。伊斯兰教在20世纪初走向衰落,二战后随伊斯兰复兴运动再次兴起,对内重整旗鼓,对外扩张的势头重现。

冷战后,民族宗教问题凸显,因民族宗教矛盾引发的地区冲突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宗教积极参与国内国际政治事务和社会事务,宗教对话与交流不断深入。新兴宗教不断发展,邪教泛滥也成为世界各国要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

二、宗教对一些国家的内政外交产生重要影响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① 因此,宗教这一人类最古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一种承载着各民族深厚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必然对相关国家的内政外交产生重要影响。影响较大且突出的,莫过于基督教对欧美、伊斯兰教对穆斯林国家、东正教对俄罗斯的影响,以及天主教对拉美国家、印度教对印度、犹太教对以色列、神道教对日本的影响等等。从积极方面说,宗教有政治整合功能、心理调适功能、道德教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5页。

功能、社会公益功能、文化推动功能;在一定条件下它亦会成为分离族群、愚化民智、掩盖恶行、妨碍革新的消极力量。正因为如此,宗教容易被利用或歪曲。无论是宗教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也好,还是今天它成为当今世界冲突与热点问题背后深刻的背景也好,都是其社会功能的体现,是它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表现,是它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其他因素施加影响的结果。戴维·赫尔德指出:“世界宗教已经培育了具有巨大权力和资源的宗教精英与政治精英,他们有能力动员军队和人民,能够形成跨文化的认同感和效忠感,或者能够提供根深蒂固的神学基础和合法的社会基础”,“最明显的例子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其宗教的动员能力与扩大军事力量和文化影响的能力是结合在一起的”^①。

(一)基督教在欧美

自从公元4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它就在被不断改造的过程中一直在为欧洲世俗王权提供神圣的合法性,是世俗王权头上的神圣光环。虽然权力与世俗利益之争使罗马教廷与世俗王权经常处于对抗关系,但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基督教信仰的疆界不断拓展,使基督教成为整个欧洲的一统信仰,并最终在它的基础上形成了欧洲文明。人所共知,欧洲文明(西

^① 戴维·赫尔德,《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方文明)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文明,离开了基督教文化,也就没有欧洲文化和西方文明。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时产生的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而当时确定的“教随国定”的信仰原则更是进一步形成了欧洲许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信仰的纽带,使基督教的特定派别成为特定国家凝聚人心、推动发展的信仰基础,而教会也逐渐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西方殖民扩张时期,基督教完全与殖民者站在一起,成为欧洲殖民者对亚非拉进行文化殖民的重要工具。

基督教虽然不是美国的国教,但它始终与美国历史的进程紧紧交织在一起,对美国的政治、法律、文化、外交、伦理等各个方面发挥着巨大影响。基督教传入美国虽是因为英国不从国教的清教徒逃离英国君权与圣公会的迫害,但自从1620年11月“五月花号”抵达新大陆以来,欧洲移民带来的清教伦理一直是美国立国的价值基础,数百年来美国社会一直坚守着 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传统,很多美国人直言不讳地承认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在这个“宗教性最强的国家”,基督教对美国的内政外交发挥着重要影响。宗教自由已经深深地植根于美国人的思想观念之中,这种强大的宗教基础使美国人天生具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一种基于宗教道德的理想主义,深信自己是“被拣选土地上的被拣选的子民”,“有责任将自由带给全世界”。20世纪先后兴起的基督教基要派、福音派和宗教右派正是基于这种土壤。20世纪80年代以来,宗教右派崛起并与共和党

保守力量结成政治上的联盟,主张信众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事务和社会问题(社会道德)上,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事务(选举和立法),并对外交事务施加影响,不可避免使美国外交政策打上人权高于主权的意识形态烙印。

(二)伊斯兰教与穆斯林国家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顺应了历史潮流,在这面神圣旗帜的凝聚和号召下,阿拉伯人走向统一,先后建立起横跨欧亚和北非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创造了辉煌的伊斯兰文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世界在寻求当代复兴的过程中大多选择了伊斯兰的回归之路,强调回归伊斯兰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对阿拉伯世界起到了凝聚、团结的作用。为应对西方基督教强势文化,伊斯兰教对穆斯林世界内部的凝聚作用不断被强化,其对外的文化旗帜形象亦愈来愈鲜明,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国际形象和信仰立场也深深打上了伊斯兰教的烙印。而对处于阿拉伯世界之外或边缘的穆斯林区域,正在复苏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双泛思潮,甚至宗教极端主义则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他们保持民族宗教“特色”、强化对所处主流社会对抗,甚至争取民族分离、分裂的精神支柱,由此刺激并推动了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对东南欧、中亚、南亚和我国西北地区的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三)一些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与启示

威尔·杜兰认为,在文明诸要素中,宗教的作用是“人类以超

自然的信念来安慰其悲惨的命运,提高其人格,并强化社会秩序及其本能”^①。正因为宗教信仰具有相当强的内在约束力,只要借用宗教信仰的形式就更容易被广大信众所接受和遵守,因此,大多数国家的统治者非常注意妥善处理宗教问题,尽可能将其改造成神化统治秩序的工具,使宗教客观上起着巩固统治阶级政权、维护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总的看,各国都很重视宗教问题的作用和影响,许多国家成立有处理宗教事务的机构,具体负责处理宗教事务,多数国家在国家的基本法中确立了国家与宗教关系的基本原则,一些国家还专门制订了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一些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做法以及不同时期的做法是不完全相同的。在这个问题上主要看两点:一是如何对待与本民族文化相对应的传统宗教,一是如何理解宗教信仰自由,也就是如何对待外来宗教。处理宗教问题的做法主要取决于其政教关系传统,无外乎三种类型:政教合一、政教分离和介于二者之间的类型。政教合一类型包括由宗教权威主导的和世俗政权主导的两种;即便不是延续历史上的政教合一关系,政府与传统宗教之间的关系也继续保持着历史上的融洽关系;政教分离虽然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理念和基本原则,但任何国家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历史上千百年延续下来的传统,继续赋予传统宗教以优势地位。

可以说,融洽的政教关系取决于特定宗教与特定社会的历

① 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东方出版社,2003。

史对应关系,在这种对应关系中,特定宗教与特定社会具有天然的适应关系,它们拥有共同的利益,宗教与政权、宗教与社会天然地相结合、相适应。换句话说,政权产生、生长于特定的宗教文化氛围,自然地扶持、利用这种宗教;特定宗教与政权、社会天然结合,支持政权并从政权的扶持政策中受益。这就是大多数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常态。也就是说,大多数国家的统治者都把传统宗教视为自己天然的盟友,是统治、治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经济基础发生深刻变革的情况下,包括宗教在内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需要,代表革命的力量就会对维护旧制度的宗教开战,“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①但其根本目标是向旧制度开战。在社会形态相对稳定的时期,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当社会风气过于崇尚宗教,造成大批社会资源流入宗教机构,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与进步,政权对宗教的压制才会发生。

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教训是深刻的,虽然不能说宗教在原苏东剧变中起了决定性的或主要的作用,但宗教至少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天主教徒占人口大多数的波兰,天主教会的支持是团结工会壮大发展的重要支撑,而在罗马尼亚政局变革中,宗教问题则是直接的导火索。有人讲在波兰,“政府掌握了军队,教会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却掌握了灵魂”^①，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在取得政权的同时，如何取得民心，这是政权稳固长久的根本保证。

进入现代以来，尽管经历了世俗化的冲击，宗教仍在许多国家的内外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内作为治国安邦的价值观基础，对外作为推行国家战略的软实力支撑，宗教的地位不断上升，宗教问题的重要性不断加重。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的今天，许多国家也很重视以本民族传统文化为主线的文化战略问题，其目的就要延续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包括宗教传统，善待和利用传统宗教为己所用，并在全球化时代继续用传统文化团结凝聚民众，应对外来宗教文化的传播。

三、宗教问题是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论宗教问题》中指出，“宗教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历史和现实的矛盾相交错”，“常常与现实的国际斗争和冲突相交织，是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②，对当代世界的经济发展、政治运动、社会变迁、人类生活，产生着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宗教越来越被视为引起世界不安宁的一个冲突因素，当今世界许多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的背后都有深刻的宗教

① 中国现代国际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著，《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时事出版社 2003 年第一版，第 229 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8 月第 1 版，第 373、377 页。

背景,对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挑战。

(一) 宗教问题是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今天,基督教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内凝聚人心、对外主导国际关系、施加影响力的价值观基础,是美国反恐与谋霸背后的信仰支撑,是全球化进程中欧美推行文化霸权并进而实现美式民主的重要工具;而伊斯兰教是穆斯林国家的对内凝聚人心、谋求民族复兴,对外应对基督教强势文化、对抗美国用基督教文化“改造伊斯兰世界”的神圣旗帜。“9·11”事件以来,美国把打击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作为最主要的敌人,在反恐问题上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和阿拉伯世界暂时形成国际统一战线。随着反恐战争的深入,美国不甘心仅仅把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恐怖组织作为主要目标,错误地把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挂钩,提出“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错误概念,认为它是20世纪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继承者;将全球反恐战争重新定义为“反伊斯兰法西斯战争”,是“21世纪的意识形态决战”,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力量”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一场战争;声称要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要改造伊斯兰世界。^① 恐怖主义产生的

^① 参阅新华网专稿,“美政要频频抛出‘新型法西斯主义’一词用意何在?”,载新浪网2006年9月4日;“布什将反恐战争正式定义为反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战争”,载国际在线2006年9月8日;“美国重新定义‘反恐战争’”,《光明日报》2006年9月8日;王珍,“危险的强心剂”,载《解放日报》2006年9月9日第4版。

原因有很多,民族与宗教的关系也非常复杂,若简单把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挂钩,无疑会使反恐斗争扩大化、复杂化,触及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情感和宗教意识,从而加剧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矛盾对抗。加上近年欧洲接连发生的“漫画事件”、“教皇讲话”等刺激伤害穆斯林宗教感情的事件,进一步激化了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对立情绪,使历史上这两大宗教之间冲突的历史积怨再次被激活。民族宗教矛盾激发的“精神原子弹”的威力是巨大的。美国出兵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从此揭开了伊拉克民族宗教矛盾的“潘多拉盒子”,使本就十分复杂的中东局势更加恶化。美国没有充分考虑到民族宗教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用过去解决非民族宗教问题的方法来处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使其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二)以宗教为背景的地区冲突对当今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在当今世界,尽管宗教在维护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往往人们一提到冲突,就自然与宗教联系在一起。一切冲突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肯定是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是由经济利益驱动的,正如恩格斯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中所指出:“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①。在当今世界的地区冲突与热点问题中,宗教无一例外都是其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8页。

的重要因素,其背后无不隐藏着深刻的宗教背景,有些冲突本身就是宗教纷争。

当代许多地区冲突和国际争端多以宗教为背景。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主线的冲突此起彼伏。在中东,受基督教西方支持的犹太教同伊斯兰教的直接对抗旷日持久,漫漫无期。在巴尔干地区,随着冲突的升级,波黑内战中东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矛盾愈演愈烈;而科索沃危机折射出当地伊斯兰教和东正教之间的矛盾。在北高加索地区,车臣分离主义分子借助伊斯兰教整合内部力量、获取外部援助,与笃信东正教的俄罗斯顽强对峙。在南亚,印巴冲突和印度旁遮普地区冲突残酷地展现了印度教与伊斯兰教、锡克教的紧张关系。在北爱尔兰,基督新教教徒和天主教徒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对立,则最终演变成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持续的武装冲突。

以宗教为背景的冲突由来已久,宗教问题再次成为世界热点问题的原因也很复杂。随着冷战格局的解体,世界各地长期被压抑和掩盖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意识得以复活,原被掩盖的民族宗教矛盾浮出水面,长期积累的民族宗教问题全面释放,越来越成为影响地区与全球和平、影响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变量;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兴起,刺激民族宗教因素进一步突出化,走向前台;同时,冷战后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突变在很大程度上也激活了宗教极端主义;而在不断深入的全球化进程中,在随全球化而来的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以传统宗教文化应对外来宗教文化的“文明保卫战”不可避免。当然,一切宗教问题的根都